

自序

我兴趣多端，百无一成。平生所写旧方志提要、新编方志序跋和方志学论说约三百余篇，已发表者百余篇。郑正西同志对中国地方史志研究有素，近年整理、研究、编刊地方志乘，作出了杰出贡献。最近搜集方志学的论著，汇录我方志旧文，作了系统的整理，选其可供当代修志参考者得二十四篇，颜曰《方志文存》，由黄山书社出版。现在国内学术论著不是畅销书，出书无利可图。经过郑正西同志的推荐，黄山书社慨允印行，使我能在晚年亲见这部《方志文存》问世，欣感无既！兹略赘数语，谨向黄山书社表示衷心的感谢！

傅振伦

一九八八年七月一日于中国历史博物馆

目 录

我研究地方志的经过和体会.....	(1)
新河旧志纠谬.....	(10)
深州风土记论略.....	(14)
修志刍议.....	(16)
新河新志述略.....	(24)
编辑北平志蠹测.....	(29)
与孙楷第王重民致瞿宣颖函.....	(55)
整理地方文献问题.....	(66)
略述历代方志体例类目的发展.....	(74)
方志与有关学科.....	(85)
编纂新方志的原则和要求.....	(97)
新志基本篇目之我见.....	(116)
方志的史论问题.....	(122)
史志叙事尚简说.....	(125)
都邑簿与城市志.....	(132)

大事纪的编撰·····	(137)
人物志的编撰·····	(146)
科学技术志的编撰·····	(158)
民俗研究史话·····	(164)
古今方志图表通说·····	(171)
谈谈史志语言·····	(181)
史志引书引文刍议·····	(193)
方志行文的规范·····	(196)
中国方志的发展与前瞻·····	(208)
编后记·····	郑正西 (227)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我研究地方志的经过和体会

我自幼受了3年村立小学教育之后，9岁（1915年）考入新河县立高级小学。历史教员安平张景明、地理教员衡水阎选明两先生循循善诱，娓娓传道了祖国锦绣山河、丰富资源以及勤劳、勇敢、智慧的祖先所缔造的光辉灿烂的文明和业绩，感到学习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，发扬光大先民的优良传统，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，是年青一代义不容辞的责任。由于时代的局限，仅知奋发图强，应树立爱家乡、爱国家思想，以身作则，从小事做起。为了宣传桑梓历史，曾与振荣弟步测我村落的四至、邻村，访问乡老，记录了我村户口、土地、土产、氏族、人物、庙宇、古物，名为《城召村历史》，这份铅笔材料至今仍然保存在箱篋里。肄业中学时，对史地仍有浓厚的兴趣，对故城郭岚光老师的讲词，曾一字不遗地写下来。毕业时以为徒讲史地，加强爱国心不足以言挽救危亡，又迷信教育救国、科学救国的口号，一方面与同学友好王飞、张博文、谢国楨、师志真等在北京创办清明中学，亲自担任史地课，一方面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专攻理科。后因事转入文科，专攻史学。还选修了理科的地理学和法科的社会科学，为研究历史作基础。

1922年夏，我考入北京大学，当时大学预科招收旧制中

学的毕业生。北大预科有甲（理科）、乙（文、法科）二部，我在甲部读书二年，又在乙部读书一年，作升入文科史学系的准备。北大预科和本科课程是一完整体系，由初级而高级，由一般到专门。甲部有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博物、国文、外国语、论理及科学方法；乙部有数学、历史、地理、国文、论理及科学方法、公民学、生物学大意、社会学大意、外国文。方志是史书的一种，研究方志的方法与历史相同。当时的北大史学系课程，对我后来从事地方志研究是极有利的。

1927年，邑绅刘国辉、庞炳辉等倡议纂修县志，设修志局。当时正与仲星帆（崇文）、脱踵武轮流主编《新河月刊》，刊载了我所写的《修志刍议》，说明方志的重要意义和应当及时修辑的必要以及新志体例和内容（又载1928年《新河县志》）。乡贤前辈约我参加修志之事。经过一年多的采访史料，补充文献，考订故实而主编成书二十六卷，分订六册（刊《新河月刊》1930年3月20日）。有纪一卷；考二十卷；传三卷（图、表、文征分见各编）。凡八十门，七十六目。另有卷首、卷末各一卷。内容如下：

卷首：自序、新志述略、襄修人员、地图等。

纪：大事记、要事始末，及灾异、故事。

考：舆地考（名称、疆域、沿革、晷度、星野、地势、地质、气候、形胜、山丘、河渠、故河道、桥梁）。经政考（营缮门：城池、公署、坛庙、庙学、堤埝；政务门：沿革、组织、经费、职官表；自治与（国民党）党务门；食货门上编为国家财政；田赋、丁徭、杂项捐税，盐法；食货门中编为地方财政；财务局与公款收支、地方附加税、公产、公债；食货门下编为社会经济：户口丁，农村经济——生产、

交易、分配、消耗等方面，附古今物产表；选举与教育门：前编为制度、儒学、书院、社学、义学，附科第、毕业生员、公职人员等表，后编为教育机关及会社、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；建设门：建设机关及组织〔建设局、县农会、村农会〕；慈善事业之设备〔串票费、养济院、留养院、仓廩、漏泽园、义学〕；井泉之穿凿、交通与邮局、建设事例；军警门：前代防守、近代保卫；典礼门：前代典礼、现代礼仪）。氏族考（附畿辅移民考）。故实考（金石门附杂器；古迹门：故城、寺观、冢墓、祠宇等；传说门）。艺文考（书录、公家藏书、金石目、文存）。风土考（篇一概论；篇二历代风俗考略；篇三近世风尚及礼俗：衣食住，礼俗〔俗尚、乡礼、家礼、岁时记〕；篇四社会现状：社会组织及生活概况；心灵态度、普通心理、平民文艺（歌谣、谚语）、语言文字、方言、秘语、宗教信仰（家庭神祇、村镇庙观、庙会、修醮、回教、西教、秘密教）。地方考（村镇总述，地方区分，各村分述）。

传：分前后两编。前编为乡贤、文苑、儒学、武林、孝义、忠节、高逸、方技附灵异、土豪；后编为名宦、流寓。

卷末（别录）：新志编纂始末、新志凡例及《修志丛刊》和《修志经过》所载的文献。

本志编纂之始，先定体例及新志纲目，曾与北大教授朱希祖、邓之诚、陈垣、沈兼士等先生商榷（见《北大学生》月刊1卷4期，1931年3月1日）。体例既定，乃就元、明、清等《一统志》、《畿辅通志》、府州志及嘉靖、康熙、光绪、宣统新河旧志参校史实，编写长编。其次拟定机关、团体、学校、农村等调查表（见新河月刊所印《修志丛刊》，1928年12月20日），派员调查、记录。整理这些材料

时，曾调取县署档案，访问野老作为补充。教育局视学、建设局调查员和城乡各级学校校长、校董、教员对于史料之搜集、记录、协助尤大。还发动了群众，尤其是知识分子，以征集碑文、家谱及私人论著。全县人民通力合作，故能事半功倍，二年完成。

以往地方志书有偏重地理沿革者，乾隆《蒲州府志》和戴震所修《汾州志》、《汾阳县志》，是最突出的例子。而一般志乘则多褒扬人物、烈女，惟善是与，文字也很芜杂。有的撮取陈言，略似类纂、书钞、文录，几不成书。章学诚始对方志义例，有所创新，以为史书志乘，体制不殊，既要有记注之功，也要有撰述之业，所修《湖北通志》为我们树立了新榜样。《湖北通志》是一省之史，为一家之言，有纪、图、表、考、政略、列传，更纂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科的档案，辑成《湖北掌故》，又纂正史列传、经济策划、词章诗赋、近人诗赋以成《湖北文征》，又以考据、轶事、琐语、异闻为《湖北丛谈》。近人梁启超独称其书。今作《新河县志》亦深体其意，并参以社会科学新知，对在内容中如有关国计、民生、社会体相等方面，则力求充实，详近略远。又侧重地方的基层——农村，以求其有裨实用。荣孟源钻研近现代史，也曾涉及此书。1972年新河兴修水利，浚河凿井，也参考了其中的故河道图，收到一定的功效。方志不仅征文考献，以成地方真实的历史，更重要的是切乎实际，对于建设新社会有实用的价值。不过此书作于五十四年之前，是有其局限性的，其中有不少封建性的糟粕。陈旧的资鉴主义史观，也很严重。对农民起义，时加指责，甚至以捻军为匪，对革命亦有贬词。有时碍于情面，有滥收的人物，也有照修志局长之旨意而行之，如唐智多以天主教为护符，仗势横行

霸道，为恶多端，初列入土豪传，竟被删去。此外，我个人的修志主张，往往力不从心，难以贯彻，也正如章学诚的《永清县志》一样，体例很好，但有时不能做到。真是高谈阔论易，踏实做去难。此志当时只印刷了600部，分发全县机关、学校，外界流行不广。北京琉璃厂书商设法盗卖若干部出售，每部卖价5元。

1929年，旧北平特别市市政府及北平研究院都倡议纂修《北平志》，因我系北平市古迹古物评鉴委员之一，奉委托草拟意见，曾草《编辑北平志蠡测》一文，谈到新志内容三编十六门，并略论修志注意事项八条。但国民党当局只是设机构，委用私人，在职人员多挂名领薪，一事不做。倒是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为搜集北平史料做了一些工作，曾调查古建筑、庙宇、金石、古迹、风俗、人物、工艺，传拓市区庙宇金石拓本，发行《北平》半月刊。当时参预其事者有顾颉刚、常惠等同学。

1933年我从北大研究院考古学会到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工作，当时北平图书馆馆长兼故宫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，着我编辑《故宫方志书目提要》，我参考1928年所拟就的《编辑中国史学书目提要之商榷》（载1933年6月《图书馆学季刊》7卷2期），特又拟定了《略例》九条（又见拙著《中国方志学通论》第七篇十六章），这不过是整理方法的初步工作。河北省是桑梓之地，江苏省是当时首都所在，即先从这两省明清方志写起，馆外方志也随收随编，约成200多篇，分订四卷，有收入台湾省所印《续四库全书提要》者。今手中仅存若干篇。现将所作河北、江苏方志提要录目于下，其中有曾属直隶省而今分属他省市者，亦并记之。

（一）河北省

嘉靖志：宣化府、开州、南宮、新河、固安、藁城、长垣、清河、内黄。

隆庆志：丰润。

万历志：广平、广宗、威县、邯郸、宁津、雄县、香河、交河、真定（县）。

崇祯志：隆平、内丘、正定（县）、蠡县。

明志：武清（残本，年代不详）。

康熙志：蓟州、霸州、保定（县）、大城、灵寿、新河、枣强、固安、良乡、香河、文安、蠡县、密云、怀柔。

雍正志：《畿辅通志》。

乾隆志：永平府、遵化州、易州、祁州、永清、献县、平谷、三河、安肃、东安、满城、武清、博野、宝坻、丰润、定兴。

道光志：南宮。

同治志：新河（光绪刻本）。

光绪志：顺天府、永平府、深州（名风土记）、昌平州、乐亭。

民国志：冀县、安次。（计存六十四篇）。

（二）江苏省

顺治志：海州。

康熙志：靖江、泰兴。

雍正志：江浦。

乾隆志：江南（通志）、江宁（新志）、六合、上元、上海、娄县、句容、盐城、溧水、高淳、镇洋、崇明。

嘉庆志：丹徒、江都（续志）。

道光志：苏州府。

同治志：苏州府、上（元）江（宁）（两县志）。

光绪志：淮安府、丹徒、嘉定、南汇、睢宁（志稿）、盐城、溧水、泰兴、高淳。（计存三十篇）

1929年至1936年间，我兼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史地系讲师，担任课目几乎一年一改，1932年讲授《方志学》。1933年即以此讲义为蓝本，写成《中国方志学通论》，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。第一篇论方志之意义及其范围（名称、种类、性质、政治作用）；第二篇论方志之科学价值；第三篇论方志之起源和发展；第四篇论方志之派别及通病；第五篇论《越绝书》、《华阳国志》，并论章学诚之方志学；第六、七篇论旧志之收藏、统计与整理（编辑方志汇目及方志统计表、方志篇目索引、方志提要表、方志别录）；第八篇论方志之撰述（志馆之组织、经费之筹措、图籍之搜集、人员之延聘、义例之订立、工作之分配、志材之董理及编辑）。为了学术研究之需要，台湾省商务印书馆1966年曾再版行世。唯此书作于46年前，自觉陈旧，文字有时不免拉杂。故于1979年从新整理修订，在《河北师大学报》连载。后由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以《中国方志学》为名，内部发行。

1932年，河北省政府奉原国民政府行政院令，纂修《河北通志》，秘书长瞿宣颖（《方志考稿》作者）兼河北通志馆馆长，聘我和王重民、孙楷第为名誉纂修，我们致函馆长，讨论修志问题（载《河北》月刊，1卷4期，1933年4月1日），并为拟定篇目：

当时主事者未能认真进行，只是征集一些零星材料，并发给幕僚戚友以稿费而已。

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，部分国土沦陷于敌，政府机关、学校、公私团体多集中后方。四川北碚是民生轮船公司

总经理卢作孚主持的四川乡村建设实验区。1944年，疏散而来的单位有270多所，他们感谢卢氏协助迁建和照顾，大家倡议创修《北碚志》，于是聘我和顾颉刚、杨家骆等为修志委员会正、副主任委员。原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气象、物理、动物、植物、历史、语言等研究所及中央地质调查所、矿冶研究所、中国地理研究所、中央农业试验所、中央工业试验所、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、复旦大学、江苏医学院、编译馆、礼乐馆、中国林学会、中国科学社、生物研究所、文史杂志社、中国辞典馆、重庆师范学校、汉藏教理院等机构，都分担了一部分编辑工作，所拟定篇目是：

卷首：北碚修志委员会组织章程，发起人名录 委员名录，编辑人名录，编纂始末记，序文，凡例，目录。

正编：大事谱；地理考（疆域沿革、政区、地形、水文、气象、地磁、地质、土壤、矿产、生物、人口）；政治略（官制、庶政、地政、粮政、财政、警卫、兵役、市政建设、乡村经营、礼制、司法、党团、参议会、迁建事业、外事）；经济略（农业、土地利用、森林、畜牧、蚕桑、渔业、交通、水利、工业、矿冶、电力、商业、金融、物价、民富、合作事业）；文教略（学校、社会教育、学术事业、新闻事业、艺文、方音方言、民间文艺及艺术、古迹、古物）；社会略（族系、社会组织、社会事业、社会运动，社会生活——生产方式，宗教信仰、礼俗岁时、社会灾害、社会病态、社会福利、医药卫生）；列传（名宦、乡贤、流寓、士女）；聚落记。

别录：文征，丛谈，丛录，机关社团录，索引。

此志类日本《新河县志》、《河北通志稿》而又就北碚情况，增加新目，可谓应有尽有。抗战胜利后，各机关纷纷

复员，编辑四散，未成全书。台湾省世界书局仅印出了自然地理部分的《北碚九志》。我所存稿仅是自编的大事谱、政治略、文教略、社会略、列传等部分的副本。

在抗战胜利前后，余仍时时以整理地方文献为念，倡议及时搜集志材。1945年12月5日在《史学杂志》创刊号发表了《整理地方文献问题》；1946年4月8日在《说文报》发表了《应不失时机地搜集并保存现代史料》；又在《河北评论》发表了《调查河北各县市情况的设计》，还为天津河北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李菊田计划了修天津志的办法。

全国解放后，中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倡议纂修地方志书，金毓黻先生在《新建设》提出意见，我也在该刊1956年6月号发表了《整理旧方志与编辑新方志问题》（1957年又收入《山东省地方志资料征集委员会地方志论文集》第一期），山东、湖南、安徽等省都积极编印地方文献资料，特别侧重现代地方革命史资料的编纂，成绩斐然。到了十年动乱时期，修志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，全行停顿。我鉴于近现代地方文献必须及时搜集，事过境迁，稍纵即逝，如不及时收集，后难为力，因又于1978年在《历史研究》发表了《方志是历史文献的宝库》的文章，强调了方志的科学价值，意在唤起史学界的注意，提倡成立机构，从事集体编写新志。1980年胡乔木始在史学会上号召，今天实在是坐言立行，不当再事推拖的时候了。

新河旧志纠谬

新河故无志。有之，自明嘉靖间溟阳蔡懋昭始（一云始于永乐）。其后陆续刊印者凡五次。然新邑多患水灾，屡遭刀兵，文献无征，修志者每感不便。旧修诸志，舛讹良多，此其因欤？且新河自西汉即已置县，积渐嬗变，已二千年。为时已久，因革多异。时隶冀州，时隶真定。古名堂阳，更名蒲泽。时而兼治南宫，时而辖于南宫。时地交错，尤易致误。兹就其义例失体与有失史法者，拉杂记之，而以事实上错误之荦荦大者附之。至若文字上、刊印上等等误谬，倘以新志与旧志参阅比观，无难知之，故从略焉。

一、新河旧志除徐元宾、徐治民自动编纂外，其余各本，均上应宪命，草草编订，计日成书，因陋就简，其不精确详审，固意中事矣。旧志多抄袭《畿辅通志》成文，略加编订，甚有摘录其文，不考实际，一仍其旧者。风土门物产一节，即其实例。

宣统间旧志即就光绪元年县志毫无增删，重行付印者。与旧志所异者，惟增新序及重刊县志姓氏表而已。

一、纪事所重，贵时间、空间二种观念之明确。旧志略传，只列某朝而略年代，至于空间方面，亦多所忽略，试览列传，便知其详。旧志选举门于近代人物之可考者，亦多略

其年月。

历代年号，间有相重者。即一代之中，亦间有重出，赵翼《陔余丛考》举例多矣。是以作史志者，须兼详年纪，以救其失。而旧志于此，多欠讲究。旧志艺文蔡懋昭《重修庙学记》中云元至元间，不云元世祖间，易与元顺帝至元年号相紊，实有不妥。新志之修，应为矫斯弊。

一、旧志之作，多重垂训。列传中只记忠孝节义，而略奸恶。详于可法，而阙于可戒，有违列传叙列之义。

一、实无其事，当付阙如，固不容稍事粉饰也。考本邑形胜，本无可记，而旧志首列八景。装点名胜，妄为附益，有违史法。

一、艺文一志，只载吏绅诗文，无裨志实。略于著述，疏于文征，此《文选》之例，非复志乘之体矣。

一、社会状况乃志文主体，而旧志于此，多所缺略。按社会制度、经济概况、普通心理、平民文艺、语言文字、宗教美术等项，旧志所阙，而新志所增者也。艺文、金石、习俗、典礼、轶闻、故事、村镇概述等项，旧志所略而新志所详者也。盖非如此，社会真象无由明悉也。

一、文人作志撰史，《史通》、《文史通义》极力抨击。唯旧志之失，不在文人之撰述，而在腐儒下士漫不加察，妄为论定也，今举例明之：

(子) 经县乃广宗旧名，东汉分新河之地以成县者，本非新河之名。而旧志不考，竟谓新河晋改经县，徐治民、王汝翰均不加检点，一仍其谬。

(丑) 旧志河渠门云：“小彰河一支东趋，由千家庄南合旧渎。又自董村分流而北，复北通于衡水。或云即古棠水之分流，不知何据。”竟不知此说实本酈道元《水经

注》。

(寅) 旧志古迹门称明太宗指九柳树以为识。太宗未悉何指，后参阅《南宮县志》知应作成祖。

(卯) 新河之名，始于宋皇祐四年，旧志沿革门谓始于元，而王汝翰县志序，沿其误而不悟，荒疏之至。

(辰) 风土志风俗门之岁时记，遗正月初八、六月初一诸礼俗，已属忽疏。而更谓七月七日新俗不以为节，实属妄谬。其物产一表，直录《畿辅通志》，不考求实际，亦属不合。

一、旧志例目，门类极不科学。天文之列灾祥，地理之列村社，其例一；建置只列城池以次十一项，而堤埝、学校亦建置之一，竟一入地理，一别立专门。不该不确，其例二；旧志列传分人才、列女二门，不以事分，而以性别。人才既列贤孝、节义，而列女更有贤孝、节烈。分类之不逻辑也如此，例三。

一、金石一门，新河亦颇有可纪，碑碣、坊额、钟鼎其类也。旧志不设此门，而以碑碣、坊额附诸杂志，殊为失体。

一、自昔图经地志，莫不扳援古人，以为桑梓生色。按孝女木兰，何承天谓任城人，李元《独异志》谓商丘人（载《稗海》中），《燕山丛录》谓亳县人，非新河人也。旧志称木兰邑之农家女，何所据而云然？且《畿辅通志》引《燕山丛录》云完县东门外有木兰庙，榜曰孝烈将军，有古碑称木兰姓魏，亳县人，云云。则木兰非新河人也明矣。原夫旧志之以木兰为新河人者，盖由明邑令徐治民之立木兰祠。殊不知邑有其庙，未必即为邑人。若果尔，则关羽、谢绪昆，新河均有专祠，岂皆新河人耶？

一、蠲賑一事，旧志视为至重，纪事序言中所谓“圣主特恩而恭录于篇者”也。然检阅旧志，实志而不详。且康熙、乾隆数次普免全国粮赋，亦未列入，非大误欤？今将可考者，一一补充之，计增四十余条。

一、旧志图考，既绘河道一图，即宜将古今河渠备录之。今缺而不录，实欠周备。

一、宣统间《新河县志》所载县境图，反不如光绪间刊印之《畿辅通志》所载之精确详明。以一律百，吾不禁为新河文献悲，而为前人之修志者羞。

以上所述，乃其大端。至若调查之疏漏，记载之失实，文词之驳杂，绘图之劣拙等等，为例尚多，兹不具述。

然责人斯易，实行良难。则安知今所以责人者，后人不又以责我哉。则新志之作，益当知戒矣！

载1927年5月《新河月刊》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深州风土记论略

《深州风土记》二十二卷，清吴汝纶撰。

同治十一年桐城文豪吴汝纶撰，三十年后由州文瑞书院刊行。凡二十一篇：疆域、河渠、赋役、学校、兵事、官制、职员、名宦、艺文、古迹、金石、人谱、荐绅、名臣、文学、武节、吏绩、孝义、流寓、列女、物产。人谱在方志中为创体。篇目次第，颇嫌凌乱。物产后成，编于书末。新河文士桐城派多出莲池书院吴先生之门，重修县志，有欲仿其体而编纂者。间尝以其义例失体告之矣，惟时至今日尚有来函以此相勉者，故略述其妄谬，以明志乘之作非可漫无新义、妄自援例也。夫修志撰史，贵乎三长——学、才、识。学贵征集而非记诵，才贵精当而非贵辞采，识贵义理而非武断。此志斤斤於文词，牺牲志实不知凡几，以文人而修志无史才也。取官、名宦，书自明代，官制终于元朝，名臣、孝义则起明代，终于清康熙，武节则止于咸丰，吏绩则讫于乾隆。考征不精，详古略今，大违志体，无史学也。摭摭前载，自以为甚详，而采录近事，则甚草率（见该书后序诸文）。有书无图，阅者茫然。自谓书名“风土记”不可无物产，而不知既名风土记，更不可不有其他详纪社会状况诸篇。众手编成之书不入艺文，物产而列风俗、乡社，建置而入疆域，书无目次，又少标题，竟无条目之可寻。不善学者，必感淆并。

凡此者无识也。而州宰朱璋达后叙犹云：“该书有志以纪其本末，复表著其由然、时日，此自载籍以来，历数千百年之久，未尝一有也。今乃于是创见之。”考表谱之作，由来久矣，千百年前已有著录，朱君之说亦不觉自愧无学乎？朱氏惜吴君止传载一方，不获天下之大，使之衡从而下上，欲使举天下文献，断送於文人吴某之手。呜呼，寡学鄙陋如此，亦大可笑已。金石注其出处，录其原文，尚合史法。所录《明洪武学校格式碑》，亦有关掌故。故此书实瑜疵互见者也。

载1927年5月《新河月刊》

修志刍议

侧闻新河有修志之议，忘我浅陋，窃有所陈。文中虽力言修志之艰与夫人选之难，而修志诸公眷念文物献征盛意，不可负也。因对于修志步第，办多所论列。无当宏达，聊资扬榘。隳越之件，阅者谅之。语多疏漏，尤希教正。夫刍蕘至鄙，有裨乎政教，杞梓朽材，无弃于贤达。闾邑耆宿，其留意诸。

(甲) 方志史略及其价值

方志之书，肇自上古。《周礼》外史掌四方之志，注曰“若晋之乘，楚之檮杌，鲁之春秋”，是其征也。《周礼》又曰职方氏掌天下之图，周知利害。当时志乘，殆重地理。洎秦罢封建为郡县，亦有图志以具述。汉祖入关，诸将争走金帛之府，惟萧何收秦图书，备知山川阨塞，户口虚实。李吉甫谓事关兴替安危，非过言也。其后挚虞、陆澄、任昉、顾野王之书，舆记图经之林，实仿于此。然率散佚无存。其传于今者，则以李氏《元和郡县志》及乐氏《太平寰宇记》二书为最古。宋代而后，方志遂重于世。元、明、清有大一统志之编订。盖志乘体制，重于元世，扩于明代，至清朝而益臻于胜。清康熙间曾诏各州县分辑志书，雍正七年因有修

《大清一统志》之举，严谕各省限期修志。当时所成省志，凡十六种。自后各省、府、州、县志有六十年一修之令，泐为定例。及方志大师章学诚出，体制益备。于是志虽方书，亦待鸿笔。编作之士，皆一时积学贤达之伦，蔚然称盛，大放异彩矣！

志乘之书，国志则率一朝代一修，省、府、州、县志则率六十年一修之令。所谓职方图籍，国之常经也。私人撰述方志，尚不计焉。而上下汲汲于志书之编纂、恒视为大政者，盖志书本身有其价值者在耳。昔明清修志御序并称曰观民设教，体国经野；曰昭一统之盛，曰表皇威之有截，明王道之无外；曰贻谋子孙，使知开创之功，思所以保持之惟谨；曰嘉惠天下后世，使辅君成雍熙泰和之治。以此为志书之用，亦嫌不足。然当时范于专制理想，固无足怪。而方志真正功用唯何，价值何在，综而论之，实不过如史而已。夫志犹史也，盖记述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，详其原委，抉其利病，征前民之矩矱，备当世之考镜，使后世览先民累世劳绩，思所以继续经营、利用厚生，发挥而广大之也。古人所谓鉴古证今，彰往昭来，感发兴起，以为世用。章学诚所谓修志者非示观美，将求其实用者也。人之所以进化，亦赖此耳。夫惟秘鲁土人尚未改其结绳 Quippus 之法，无有文字记载，是以仍昧昧无知，尚在原始社会。惟格林兰之爱斯基摩 Eskimo 人仍不知创造文字，是以至今仍未脱徯原始社会。则人类文野与载籍之关系，不岂重耶？盖志之为用，亦曰征考信，资法戒耳。岂第抒怀旧之蓄念，发思古之幽情，备掌故，征博洽，考求故实，增所未见，广所未闻，与夫周知天下险阻，虚实利害而已哉！今人有云由史志可睹文明之进退、民德之隆替，此言是已。

(乙) 方志体例之沿革与近代之趋势

方志缘起，功用既如上说，今更依其着重点之不同而分节说明之：

(一) 首着重地理图经

《周官》云职方氏掌天下之图，实开后世偏重地文地理之端倪。其后图经以图为重，凡表与略皆有须图以明之。

《隋书》著录，以舆记、图经并称，当时方志偏重地理图籍也明矣。晋常璩《华阳国志》虽注重人物，《太平寰宇记》又列人物、艺文诸目，虽经章学诚之抨击，而方志偏重地理之风不息。即就与章氏同时最负盛名之戴震而言，亦泥于古说。盖旧观念深入人心也久矣。

(二) 次着重史实

方志偏重沿革，自古已然，而学诚则极力斥之，并主张沿革与古迹，不当自为专门，又曰方志如古国史，本非地理专门；又曰考古固宜详慎，势不两全，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。其卓识如此！所撰《湖北通志》即为此种精神之表现。虽间有不合于今日者，但在当时固不祧之宗也。今人谓“地志乃史之缩本”，“方志为地方之史”，实本章氏之说。今则新史学出而志亦当与之俱变其体例矣。

清人修志，体例不一。谢启昆《广西通志》则沿《建康志》图表志传而变通之。及阮元纂《广东通志》亦采此体例。后多遵之。然乾嘉学者偏重考古，不切实用，但知堆积事实，鲜能剖析。琐碎陈腐，罕有生气，致有玩物丧志、小人怀土之消。至发揭蹈厉，开创新制，责在吾侪。修志诸公，其亦有意于斯乎？

(丙) 修志之难与修志之道

志犹史也，近世且有科学化之趋向矣。则今之修志，其必以社会体相之“志”为重心也审矣。然撰志之难，昔人言之详矣。博学能文之江淹，谓“修史之难，无出于志”；撰《通志》之郑樵亦谓“志者，宪章所在，必老于典故，然后能为。”正史廿四，其有志者十四而已。夫撰史者皆饱学之士，尚不敢妄作，陈寿号善叙述，李延寿亦称究悉旧事，然所著二史，俱有纪传，而独不克作志，重其事也。作志之难如此，修志之难亦可推矣。苟使修志重任，委诸鱼鲁末学，鹿鹿庸材之徒，见类蛙鸣，识同蠹测之辈，则虽殫殆铅槩之劳，尚虑豕鱼之混。穷老尽气，剝日铄心，亦安有所成？然则方志邦邑文献所系，修订重任，岂容章句腐儒、草茅迂士窜定于其间耶！

或曰“发凡起例，已有端绪，前人之说备矣，体制详矣，萧规曹守，事半功倍，后之修志者，但为之稍正豕亥，略备遗忘，发为言词，披为序论，所谓随绳而理，因攢而缝，固已足矣，又何必好事更张，自寻烦扰乎？”曰“吾闻书之作也，必应乎潮流。则方志之修订，不宜专详沿革与地輿矣。即虽不能完全与新史学相吻合，亦必求其近似而已。苟不是之谋，而只斤斤于程式，津津于文词，钩沈索隐，粗成一书，考之不详，核之失实，言之无物，衡之倒置，则亦何须修志，更何贵有志，又何必大事铺张，设局分职，庸人自扰乎？”窃尝考修志之义矣，盖有其用意焉：曰足其所未尽也，补其所未圆也，白其所未莹也，贯其所未一也，曰考同辨异，辑秩次编，芟衍去蔓，厘讹续脱。倘能于旧志史材一一校雠考证以鉴定之，整理类别编次以综合之，更能广罗志材

整次而增补之、重编之，则修志之义，庶得之矣。

(丁) 新河旧志有无重修之必要

考夫志乘之修也，盖有迫于势不得尔者矣。岂若好事喜功之徒，藉志取誉之陋见哉。原夫历代修志，盖有数因：一曰旧志无存，靡可考境；二曰旧志繁简失体，或妄伪舛讹，不足征信；三曰时易境迁，更多可有可纪。上自历代国志，下至各地志乘，修志诸公容有未睹，然亦不见夫李鸿章监修之《畿辅通志》乎？此志盖鉴于旧志之失体，略而不详，因有重修李卫等旧志之议。旧志不过百二十卷，及新志成，卷帙倍之又六十卷，体例更为精详。方志修订，岂偶然哉？

新河县志之编修，或云始于永乐，其后可考者凡五次：明嘉靖四十三年徐元宾始受蔡懋昭之委创为书志，后三十一年徐治民从而修之，三年始成。二本皆鉴于文献之散佚，故实之磨灭，因而编撰。其后修订四次，皆上遵宪命，仓猝写就，因陋就简，保残守阙，情致草率，略而弗详。间尝取国志正史参阅之，见讹舛误谬者有之，引证失据者有之，错置倒次者有之。最可笑者，即未见原书，而间接采自杂说。核之史籍，并无其文。且也，志而不详，详而无征，征而不要。因而全邑文献，均断送于彼一二浅陋者氓之手。吁！可悲矣！然彼寡陋县吏，昧于文献之重要，计日成书、搪塞宪令，事固可悲。曲曲下吏，识类老马，技同拙鸠，强之修志，何异螳臂挡车，其不自量而不能胜任也，固意中事矣，又安足怪！所怪者，吾县长老不引为深耻，不思所以修订之耳。然古志以兵灾游经、多所漫灭，新志旧板蠹蚀不堪，再历数年，诚恐求其不足征信者亦不可复得矣。伦每念故实之散佚，文献之无征，辄为之驛羞起面，尝有志于斯矣。然才

浅学疏，未敢果行。诚恐一有不周，恐貽姗大雅。是以踌躇至再，而终未之敢行。今幸有士绅重修县志之意，因喜资人笑柄之腐劣旧志，得以涤污代新，形成新河闾县真精神之表相之望。修志诸公，其勉之！

(戊) 编修县志之程序

地志之作，岂易言哉？贾耽《十道志》，实方志之权舆，乐氏讥其简漏。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志》一代巨制，大体贍详，体例甚善，是以《四库全书》用冠地理志之首，而乐史刺其阙遗，孙星衍谓间有异说及疏漏之条，而李氏更自谓学非博闻，识愧经远，驰鹜虽久，漏略犹多，因有每自循省，赧然收汗之叹。陈芳绩《历代地理沿革表》博考详稽，囊括今，体段已完，而黄廷镗犹以其条理未密，而其自序有“草茅一介，有未能悉致天下之书之恨，而尤愿当世通儒硕彦，考而正之”之殷。朱彝尊《口下旧闻》采摭群书千六百种，金石掌故无不探访，二年之间，日不停披，手不绝书，徐元文谓从来著述家所钞未有若此之富者也，然犹欲然不足，以一二书籍不得见为憾，因有“欽命”修考之旨。王锡祺之撰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也，凡涉及地书，备极搜罗，得千数种，成数百万言，尚谓非敢纵谈九垓八埏，不免夏虫井蛙之消。顾祖禹撰《读史方輿纪要》，魏禧称为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书，成于二十一年之功。英人H·R·Mill博士主纂《万国地志》International Geography驰名中外矣，辅纂者有七十名人之多。昔者孟坚有丹阳楚都之误，山经水注沿庐江彭泽西之讹，师古以为宁国、九江、当涂、章华谓在姑熟。凡兹迷谬，难可缕陈。此皆学贯垓埏，胸罗括地，尚复尔尔，况其下焉者乎？徐元文有云“甚矣著述之不可轻

言，而地理为尤难。”诚笃论也。吾新河虽广袤不过五十里，村镇不足百八十，地若弹丸，然远自西汉，已列侯国，绸缪涌演，已二千一百又二十一年矣。其间制度之损益，教化之兴替，风俗之转移，文质之递变，历代陈迹，虽见诸史籍，流传民间，搜讨证考，多有故事可寻，然年纪穹远，史实就湮，更多经水患兵灾，志乘荡析，则博考详稽，不云易矣。志虽方书，亦安可率尔操觚，任意窜定所能成者哉？步第如何？手续何若？苟不预为计议，详为考较，漫无目的，诚恐瞽者无相，依依不知何之也。爰草具体意见，以资商榷。

夫既有重修县志之决心，则必先组织新河县志编纂会，从事搜集材料、编订、刊行矣。顾兹事体大，事前亦当有所规划，今略论之。

一、购置必要图书

欲修志县，非有充分之学识及丰富之参考图书不可，爰择有助修志重要图书，列之於后。宁简不繁，以便取材，非敢矜博务广也。

1、体例类：《章氏遗书》（章学诚），《修志略例》（张之洞）。

2、编纂方法类：《史学要论》（李大钊译，又有李思纯译本，二者书名相同），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（梁启超）。

3、材料：历代郡县志、地理之书其有关新河者，均可摘要购置，至若经史、文集、稗乘、别录、公文档案、轶闻故事，谰言琐语，片纸隻字，皆有可采，断碑残碣，所在应求，是在采其精要，剔其讹伪，或引为旁证，或备异说耳。

二、首宜起草新志例目，以便分门别类，逐类编辑。

三、次宜草拟征集材料条例及调查表格，以便分途罗致志材，从事调查。

四、编辑会之组织

宜设总纂一人，总理撰述，下又分若干组（如大事记组、风俗调查组等等），各有长，各设采访员若干人，各有导师指导工作。（如史料如何采集、调查、搜集，如何分类整理，如何鉴定，如何编纂等等）。至若绘图、造表、誊写，均设专职。此志体小，可以兼任。只有一技之长或一节可取者，即可聘用，以广收丰富志材之效。昔《海阳县志》之修也，购单四出，遍求遗文，广询野老，纤悉毕陈。《万国通志》之编也，有征稿办法，皆可为法。惟材料冗杂，摘要撷萃，是在编纂善为鉴定决择耳。

以上所谈，系一时管见所及。至于编志之条例、例目、组织调查等事，当分在本刊（指《新河月刊》）披露。

载1928年12月20日《新河月刊》

新河新志述略

1. 本志，起自往古，断于民国十七年；统城鄙乡关之各种情形，通而述之；仿《元和郡县志》、《元丰九域志》之例，而标名曰《民国十七年河北新河县志》。

2. 是书正编二十四卷，卷首、卷末各一卷，都为二十六册。

3. 章学诚之言曰：“志者，识也；简明典雅，欲其可以诵于识也！删繁去猥，简帙不欲繁重；籍书案牘之详，自有掌故专书；各体诗文，自有文徵专书。志则出古国史，决择去取，自当师法史裁，不敢徇耳目玩好也！”本志之作，则力矫八忌，务求四要，庶足称一方信史，而备国史之采择矣！

4. 古代志乘，偏重地理图籍；常璩《华阳国志》更详人物；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因之，更别设艺文一目；至周应合《景定建康志》分图、表、志、传四篇，体裁始备。其后修志，多师其意。虽列目较多，而别统以纲，但鲜能出其范围。清谢启昆《广西通志》分典、表、略、录、传，体制益详。本志之作，则分纪、考、传三篇；而以图、表，酌列诸门之内，以便相互发明，逐类旁通。纪者，记也，本其事而记之也；志者，誌也，积其事而记之也，所以详掌故典要，犹正史之书志，而所谓“纲记鸿裁”、“编摩伟号”之略者

也；传，志人物者也。

5. 书、志、意、典、录、说、略、考，名目虽异，其义一揆。刘子玄以为作者爱奇，耻於仍旧；章学诚谓各有旨意。

（见《章氏遗书》外编第一《信摭》）谢阮二书，宗法渔仲，忠襄所作，改从贵与。章氏《湖北通志稿》考略并用。本书既名县志，则名书志为考，以示区别，不依通志之以略为名者，通志、县志，质不同也。

6. 方志为国史资料所出，兼为地方行事之准绳，故今就所知，详尽遍举，以为国史约取余地，并悬为一县之典则。

7. 志者，社会之写真也，故本志社会概况列目较详。凡关切要科目，应行详志者，旧志或缺或略，本志补而详之，社会概况，庶得赖以备举而明悉。社会制度，农村经济，普通心理，平民文艺，语言与文字，宗教与信仰，美术诸目，旧志之所阙而本志之所增者也！艺文，金石，习俗，典礼，轶闻故事，村镇概述诸目，旧志之所略，而本志之所详者也。今地方考，尤为详悉。当世览者，庶得以考见新河社会之详也。

8. 纪事之体，向分为三：编年体、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是也。各有其利，亦各有其弊：编年体大事备举，语无重出，而简于叙事，阙载良多，事以时分，因果难究；纪传体原委详该，洪纤靡失，语多重复，纲要难周；纪事本末体文省事豁，体圆用神，各详起讫，条理分明，然於“通”与“博”之义，尚欠精详。今之修志，三体俱备，互救其失；仿编年体而编大事纪；更仿纪事本末体而作要事始末，以救编年体之失；仿纪传体而撰列传，又仿“正史”书志而作考。隐显巨细，备举无遗，社会真象，庶得以益臻明详。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9. 文人修志纂史，刘知几、章学诚抨击之。惟新河旧志之失，不在文人修志，而在于腐吏之敷衍宪令，仓猝就事，因而因陋就简，计日成书；甚至一仍原文，仅增编纂人表，宣统元年县志因仍光绪元年之旧本，其显例也。今修新志，则对旧志之未备、备而不详，以及误谬舛讹，均一一增补厘订。后之览者，岂亦有取于斯文！

10. 形状名象，专赖文字记述，定有未周。今本志广增图象，以救其穷。文省而事无所晦，形著而言有所归，图作而考自简，若河渠、堤防、学校、城池、村镇等等，均列以图，使阅者披文而得其原委，察图而洞其形体。文省事明，殆至善也。

11. 郑樵尝云：“图谱日亡，书籍日冗”。万季野云：“史之有表，所以通纪传之穷。表立而纪传之文可省；是以表缺而列传不得不繁。诚以无表则人虽无可称述，而亦需为文以称其事也。”今亦广列表谱，以齐名目而节篇章。大事记表宜于旁行斜上之格（即年经事纬）者；名人世系表，宜于支干分合者；选举人表，宜于纵横而直列之格者。

12. 一般志乘，多表自为帙。《山西志》以图冠首，师贾耽之意，分别朱墨。嘉庆《四川通志》则以图分冠表说之上，则古左图右史之意也。今志则以图表分录各类之下，以便参阅。至有须说明者，则附说于图，亦土诵、诵训之义。

13. 本志正编之外，仿志乘“余编”、“杂志”、“丛谈”之体，立“别录”一编。凡无可附丽者，均编入之。亦犹经之“别解”、史之“外传”、子之“外篇”，盖以征材之所余也。凡阙访拾遗，旧志序跋，修志文徵，或存疑，或备考，或广备异说，概归此门，以佐考证。

14. 《荀子·非相篇》曰：“传者久则论略，近则论

详”。章实斋《与戴东原论修志》亦云，“史部之书，详近略远，诸家类然。”今修此志亦以侧重现代为主，良以当代各事皆由最近历史递嬗而来，其关系尤为密切也。

15. 本志记事，恪遵史德，力求真实。文称其实，辞敷于事，不铺张，不扬厉。其烦省亦求至当，不妄载，不阙书。论赞无味，均付阙如。

16. 载笔书事，倡用世语；盖史者，当代之文也，不如是不足以考古今之变，民俗之殊也。

17. 宋人修志，多用古名；即唐以前诸地郡书，亦通多此病。今极力矫正，以求厥真。

18. 史有互著之例，今仿行之，以节篇幅。

19. 本志有注，以详所本，旁闻、异说及阙疑，均于自注中详之。

20. 史籍所载，关于统属新河之郡府州之事迹，凡笼统含糊，未经析分而不确指新河者，概不滥载。

21. 凡一日而事实繁重，篇页过多者，或一类之中，而其性质微有不同者，则分数篇编次之。

22. 书事纪年，皆于年号之上冠以帝王年号及甲子，以免混淆。

23. 事实年月，除十六年十七年大事记表，采用阳历外，其他概用旧历，以阴历盛行于乡鄙也。

24. 本书原稿，旧有句读，以排印需工，校对又多感不便，故均删除之，阅者，当有以谅之。

25. 书中称志，指《新河县志》言；称“通志”，指《畿辅通志》言；称《统志》，指一统志言。多标所修年代，以便参阅。

26. 书中所称京钱若干千者，即指铜元四十九枚为一千